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学术文集

The Symposium of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of CASS

于沛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3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

The Symposium of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of CASS

第3集

于沛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3)/于沛主编.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12

ISBN 7 - 210 - 03064 - 6

I. 世... II. 于... III. 世界史 - 文集
IV. K1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937 号

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3)

于沛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20 千 印数: 1 - 1200 册

ISBN 7 - 210 - 03064 - 6/K · 376 定价: 20.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 6898827 电话: 6898893(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于 沛	
救亡图存和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萌生	1
姜 芑	
世界史与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	36
王 彤	
战后中东国家政治制度的多样性	61
毕健康	
当代土耳其政治制度评析	81
黄立菲	
对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苏联社会情绪 激进化原因的思考	105
孙建廷	
试论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回归	123
易建平	
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136

刘 健	
论阿卡德人的民族特性	173

胡玉娟	
古罗马的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从 罗慕洛到奥古斯都	189

姜 南	
法德关系与早期欧洲一体化(1944—1963)	214

徐再荣	
环保主义与国际环境合作——1972 年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评析	233

刘 军	
权利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	254

顾 宁	
1949 年到 1978 年的中苏中美教育交流	270

CONTENTS

Fighting for the Survival and Salv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Germination of the Chinese Studies of World History	Yu Pei
World History and Braudal's 'Economic World'	Jiang Peng
Diversified Forms of Political Systems in Post War Middle East Countries	Wang Tong
On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al System	Bi Jiankang
To Ponder over the Courses of the Radicalizing the Soviet Social Moods in the Late80s	Huang Lifu
On the Rebirth of Etatism in Russia	Sun Jianting
Tribe Alliance or Nations?	Yi Jianping
On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Akkadians	Liu Jian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s and Foreign Religions in Ancient Rome—from Romulus to Augustus	Hu Yujuan
French and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Early European Unification(1944 – 1963)	Jiang Nan
Analysis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	Xu Zairong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the Viewpoints of Rights	Liu Jun
Sino – Soviet and Sino – US Educational Exchanges in the Cold War Years	Gu Ning

救亡图存和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萌生

于 沛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从 19 世纪后期中国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的,它和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这一时代的主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这时还谈不到一般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还只是近代国人对世界历史最初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完整的,甚至是幼稚的,但它毕竟是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可以看作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萌生时期。这一萌生时期,大体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期间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近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变化,时代的呼唤,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它的突出优点和特点,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始终贯穿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在一个半世纪以后重新回顾这段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睁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后新的社会思潮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和清王朝的无能,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被

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朝野震动。举国上下在深感奇耻大辱的同时，一些人开始重视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了解，以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急切地开始探索世界大势，企图从中求得“御夷之策”。一股“睁眼看世界”的新思潮由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成为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和姚莹等为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国近代的世界历史研究，是在鸦片战争时期酝酿发展起来的。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表现出崭新的时代内容。

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内忧外患不断。进化史观开始传播，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成为民族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第一次研究外国史地的高潮。外敌频频入侵不断加剧，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是这一时期研究外国史地的高潮强有力的直接的动因。它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迫切要求了解世界的风云变幻及历史渊源，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列强意在中国的远东争霸，已经开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例如于 19 世纪 30 年代，俞正燮（1775—1840）编撰有《俄罗斯事辑》《俄罗斯长编稿跋》；萧令裕撰有《记英吉利》；叶钟进撰《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等，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是记叙中俄关系、中英贸易关系史。但是，真正使中国人走上了认识近代世界历史与现实道路，还是在鸦片战争期间。1839 年 3 月至 1840 年 11 月，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为了了解西方列强的历史与现实，积极组织翻译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编译出大量的外文书籍资料，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根据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亲自润色、评述，编译成《四洲志》，较完整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 30 多个国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以及宗教等等。《四

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外国史地的志书,被公认为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名著之一。1841年6月,林则徐在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途中,在京口(镇江)与魏源相会。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编译《四洲志》和《澳门月报》等资料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新的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50卷本。魏源在《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中记载了此事:“万感苍茫日,相逢无一语。风雷惊蜃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自注:“时林公嘱撰《海国图志》。”

1842年底,《海国图志》50卷本刊刻于世,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世界史地的著作,揭开了近代中国世界史地研究的崭新一页,使闭塞已久的中国人开始有了全新的世界概念。《海国图志》50卷本约57万字,其中地图23幅,洋炮插图8幅。与林则徐8万多字的《四洲志》相比,内容有了明显的增加,包括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以及宗教、文化、教育、风土民情等等。后又经过两次增订,为1847年的60卷本(60余万字)和1852年的100卷本(88万字,地图75幅,各种插图64幅)。魏源52岁中进士后,曾到过香港、澳门,并在香港购得一本国外出版的地图集,后将其补入100卷本的《海国图志》中。100卷本补充的内容,除了该地图集外,还有来自以下著作中的内容: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

近代东西方的交往始于16世纪中期,是随着世界“新航路的开辟”开始的。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马窦绘制“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1601年献给朝廷,以后庞迪我、熊三拔二人又有《图说》加以解释,第一次将“五大洲”的概念介绍到中国。稍后,艾儒略著《职方外纪》,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外国地理的著作。清朝初年,南怀仁撰有《坤輿图说》。但是这些并没有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接受。国人认为这些都是荒诞不经的海外奇谈,坚持认为天圆地

方,中国位于其中,并为天下最大。上层统治阶级更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将其他国家都看做“蛮夷之邦”“化外之民”。从明朝末年利马窦来华到19世纪末的200多年的时间,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人。近代中国著名爱国主义思想家,近代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15岁中秀才,29岁中举。后屡试不第,直至52岁中进士。曾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两淮盐务司海州分司运判、高邮州知州等职。60岁时被劾革职,64岁时病逝于杭州。

魏源一生经过了乾、嘉、道、咸四朝,这一时期,中国正是由封建社会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发展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社会深受震动。魏源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中国社会“大变局”的开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在悲愤之际完成了40余万言的《圣武记》。该书14卷,前10卷主要是回顾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历史。后4卷主要是魏源自己对军事等问题的论述。魏源认为,“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从清王朝的历史中,寻找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武器。落后的满族正是向明王朝学习之后,才战胜了明朝,夺得了天下。

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汲取教训,认识到“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1]因此开始编撰《海国图志》,希望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这也就是魏源所说的:“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2]他认识到,今日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已经不是历史上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夷狄”,应该承认他们的长处,同时也承认自己的落后,然后向他们学习,使自己的实力增加,不再受西方列强的凌辱。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制夷——悉夷——

师夷”的思想。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中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方面的内容等等。

《海国图志》引用了 100 多种中外著作,30 多件奏折以及作者自己亲自搜集到的一些资料。主要分成以下三类:其一,历代正史 20 余种;其二,中国古代的有关域外的地理著作和其他的有关著述,以明代以后的为主,70 余种。如引用徐继畲的《瀛寰志略》33 处,约占原书的 1/4,约 4 万字;其三,外国人的著作。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的著作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的著作,约 20 种。主要有利玛窦的《地图说》、意大利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四海总说》、比利时南怀仁的《坤輿图说》、毕方济的《灵言蠡勺》、高一志的《空际格志》、傅泛际的《寰有诠》、蒋友仁的《地球全图》、汤若望的《远镜说》、英国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美国培瑞的《平安通书》、美国理哲的《地球图说》、英国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玛吉士的《地理备考》、美国高理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德国郭实腊(郭士力)的《贸易通志》。另外还有《圣经》《澳门新闻录》《滑达尔各国律例》《华事夷言》等。

魏源是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在回答“是书何以作”时明确指出: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制夷——悉夷——师夷”的思想提出后,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向西方社会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的社会思潮由此得到迅速的发展。“制夷——悉夷——师夷”的思想

是当时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些志书紧扣时代的脉搏,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魏源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地理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名著。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变法图强的思想,对邻国日本的近代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知识分子从中了解了西方的社会、历史、地理,而且对于其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明治维新思想的萌生都有积极的作用。

魏源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中国也仿效俄罗斯彼得大帝,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3]

除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外,鸦片战争后研究外国史地的重要著作还有徐继畲撰写的《瀛寰志略》10卷,约15万字。1848年刊刻出版。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年间中进士,后在闽粤沿海地区任职十数年,鸦片战争后任福建巡抚。同治年间清王朝兴办洋务时,徐继畲因长期关注外国问题,被调往总理衙门任职,同时主持同文馆的工作。

为撰写《瀛寰志略》,徐继畲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准备,阅读了大量的西文资料,如该书《凡例》所言,使用了“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这些资料,主要是徐继畲担任福建巡抚时,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较为准确。徐继畲花费5年的时间,将所得资料融为一炉,完成了这部著作。全书约15万字,地图42幅,以图为纲,较系统地介绍了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

近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和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简况,尤注重美国、英国、法国等国重大事件、商务关系。该书十分重视地图的作用,广泛汲取了新的科学知识,纠正了以往对世界其他国家历史、地理的错误认识。它因能够“博采前贤著述,正其舛误”,而且“考核甚精”,所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史地的最早的两部书。在 19 世纪后半期,《瀛寰志略》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必读书。

姚莹撰写的《康輶纪行》16 卷是鸦片战争之后介绍外国状况的著作之一,记有英国、法国、印度、俄国、尼泊尔、锡金等国的历史知识。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嘉庆时中进士。先后任福建平和知县、江苏高邮知州。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兵备道,曾率军民奋力抗击侵台英军,打退侵略军的军舰。但他的爱国行为却为投降派嫉恨,受穆彰阿等人的陷害,被贬官四川。在此期间,赴西藏地区进行考察,撰有《康輶纪行》。咸丰年间,被诬陷事得到平反,先后出任广西、湖南按察使,后死于湖南任上。著有《中复堂全集》,保存有他的大部分作品。

1844—1845 年,他在西藏进行考察,在记述西藏各方面情况的同时,还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对印度等周边国家以及与这些国家关系密切的英国、俄国等国的历史状况进行了研究。姚莹认为,尽管英国、俄国在中亚一带有利害冲突,但是对中国却都怀有侵略扩张的野心。姚莹从切身体验中,明确指出,“闭关锁国”乃是“误国”之路。坐井观天,无视世界之变局,实际上是愚昧无知,必将招致强敌入侵。他认为及时、准确地了解世界的形势以及世界形势的演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将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往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与最新的世界地图进行比较,以求能够准确地掌握最新的外国史地知识。他对林则徐、魏源十分钦佩。在思想上特别是在“睁眼看世界”方面,三人有不少相通之处。

1846 年,梁廷枏撰写的《海国四说》刊行,这是这一时期与姚莹

撰写的《康輶纪行》同样重要的外国史地著作。这部著作强调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没有明确地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但却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殖民统治的思想倾向。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号藤花主人,广东顺德人,仅在道光年间得过副贡生。曾任广州越华、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学长、澄海县训导等职。早年从事辞章考据之学,撰有《金石称例》5卷、《南汉书》18卷、《南越五主传》等。梁廷枏属于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员。他热爱祖国,强烈地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在广州积极参加抗英斗争,全力支持林则徐打击入城的英国侵略者。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于1846年刊行后,1848年4卷合成。至咸丰时期,稍作修改后重新刊行。该书由《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3卷、《兰仑偶说》4卷、《粤道国说》6卷组成,主要文献资料来源于西方学者的著作和报刊中的文章。《合省国说》(美国史)主要是参考了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而写成,主要内容包括美洲大陆的开发、美国独立战争和华盛顿的历史作用等。梁廷枏明显地受到裨治文所表现出的西方历史思想和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与中国传统史学突出政治史和皇室世袭更迭不同,阐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美洲大陆发现的历史沿革以及疆域、气候、文化、宗教、习俗、物产、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等。《海国四说》既是有关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清王朝断代的中外关系史。

沙皇俄国是中国的邻国,与中国接壤长达数千公里,觊觎中国由来已久,对此,中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早有警觉。鸦片战争之后,对俄国史的介绍和研究引人注目。早在19世纪中期,林则徐、魏源、姚莹、何秋涛等人就开始关注俄国问题。1878年,鹭江寄迹人根据俄国的历史学著作译纂成《俄国志略》,通过历史的叙述,揭露俄国侵华阴谋,强调对沙皇俄国应严加防范。关于这本书的资

料来源,作者说明是“译录其国史之大略”。该书的篇幅不大,但是内容较丰富,对当时的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按语”说:“其俄国所留心著意,无非侵占邻国地土为务。比现在形势而论,西边有英法德奥意各国,皆虎视眈眈,断不容他人有侵占之事,行之甚难。若南边虽小,有隙可乘,欲行侵占,英国必起而争之。此又不能如愿,行之亦不易。其稍可注意者惟东边耳。俄国之东界,乃我中国西北境,若不及早设防之,恐将来事机一露,即难收拾矣。俄之行为险诈,居心叵测,若视之兵戎,尚可预防,倘于玉帛礼貌而来,尤属可虑,不知其蓄意如何,更须严防为是。”^[4]当时的一些人认为,“俄之行为险诈,居心叵测”超过英国,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侵略中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的财富;而俄国却是要利用和中国接壤这一地理位置,掠夺中国的国土,扩张沙皇俄国的版图。对此,作者呼吁中国人民要“严防为是”。

二、洋务运动和对世界历史的新认识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开设工厂。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王朝中的一些高官为了达到“富国”的目的,开始仿效西方,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生产技术,兴办“洋务”,创办自己的民族工业。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创办的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如军工厂、造船厂等,较著名的还有交通运输业和工矿企业等。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在缫丝、纺织、煤炭、粮食加工和火柴等行业也都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亲身体验、了解进而研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些宝贵的感性知识,为他们对外国史地的编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洋务运动的兴起促进了以实地考察为主要特征的外国史地研究。王韬等

人的著作表明,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已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外国史地的介绍和研究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具体内容之一,既是当时中国走向世界的反映,同时也推动了这一进步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徐建寅(1845—1901),江苏无锡人,科学家。早年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后到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地任职。1878年出使德国,任参赞,主要工作是考察德国、英国、法国的工业发展,采购枪支、弹药、舰船等军事装备。在德期间,将《德国合盟记事》译成中文。王韬则是这一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事发,被清廷通缉,逃亡香港,直至1884年。在香港期间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经书的同时,开始关注世界史地情况以及中外关系,并加以研究,曾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主张变法图强,强调中国顺应世界之“变”,乃“势所必然”。王韬是我国19世纪研究世界近代历史的先驱之一,主要代表作有《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此外还有未刊行的《西古史》《俄罗斯志》《美利坚志》等。

1867年应理雅各之约,王韬赴欧洲旅居3年,其间除了帮助他翻译典籍之外,还曾经两次到法国,较多地了解了法国的历史、地理、民俗和社会现实,亲自体验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这一切使他感触颇多。在法国,他结识了通晓汉语的法籍犹太学者儒莲,与儒莲有较密切的交往,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外国史地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多是外国人自己写的,不仅内容是关于外国的历史和地理,而且所表述的思想感情自然也是属于外国的,如慕维廉的《大英国志》、裨治文的《联邦志略》、闾斐迪的《俄史辑译》、冈千仞的《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等。王韬认为这些外国史地作品多有

谬误,颇不以为然,于是就萌生了亲自撰写法国历史的想法。1870年王韬自欧洲回到香港后,恰逢丁日昌希望将其所作的《地球图说》中的《法国图说》部分“增辑史事,裒益近闻,著为定本”。丁日昌的这部作品,按照当时流行的方法,主要是根据美国人的著作译出的,各方面的局限显而易见。王韬于是开始广泛收集史料加以补充,同时加进自己在欧洲的所见所闻,编撰成《法国志略》14卷,1890年增订为24卷,使其内容更加丰富。《法国志略》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开国至拿破仑第三时期,约1600年的历史,这是中国人第一部研究法国历史的著作,也是第一次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始末。王韬虽然是在撰写《法国志略》,但处处体现出对当时中国现实的关注,所以在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中,愈益发挥着广泛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

王韬十分赞赏法国“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是他矛盾的历史观的具体反映。他在反对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则亘古而不变”,他既反对“政出一人”的专制统治,又反对“视君如弈棋”的“民主之国”的社会改良主张。在他看来,“专制”和“民主”都不可取,只有“君民共主”才能够“上下相安”,使国家远避动乱之源,稳定发展。

《普法战记》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欧洲战史的著作,也是第一部记述巴黎公社的著作。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首先报道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王韬从欧洲回到国内,与张宗良合作,编译了不少报道,交由这些报纸发表,以后将这些报道收集在一起,同时补充其他文献资料,编辑成《普法战记》14卷,1873年8月由中华印务总局排印发行。1886年,王韬又根据普法军队中的有关文件以及世界各国的相关评论,增补为《普法战记》20卷,对普法交战期间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有较深入的论述。近代中国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了解,对于法国无产阶级的惨烈斗争,正是从这时开始的。鉴于